

港英時代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教科書 對香港淪陷史論述匱乏情況初探¹

譚家齊*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本文探討二戰結束至九七回歸之間，香港中學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下稱兩史）教科書如何處理有關香港淪陷及日治的本地歷史問題。在搜羅 1945 年至 1997 年間香港初中及高中課程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有關二戰的篇章，以及上世紀 60 年代以來香港政府教育部門的課程發展檔案後，梳理出戰後數十年間對香港淪陷論述的變化。因為高中課程有公開考試的限制，淪陷議題主要在兩史的初中課本之中。其中發展趨勢是從完全漠視，到漸在注釋、圖片、教師用書粗略交代，再到以正文正面論述。在文獻分析和對重要持份者訪談的基礎下，本文歸納兩史教科書略過本地淪陷史不談的原因，並非是港英政府有刻意隱諱的政策，而是跟教科書作者忽視本地歷史，以及作「不談政治」的自我審查有關。至於史學教育界對兩史加入日治等香港史內容有強烈要求，大抵是回歸前港人主體意識覺醒的結果，才最終令這個備受冷落的歷史議題，正式成為香港史學教育的一部分。

關鍵詞：香港淪陷；日治時期；本地歷史；中國歷史科；歷史教科書

引言

日本於 1941 年 12 月 7 日偷襲美國太平洋海軍中樞珍珠港，同時亦進攻英國的東亞屬地，香港成了侵略目標（由於時差的緣故，日軍攻港在香港時間 12 月 8 日）。雖然駐港的大英帝國軍隊負隅頑抗，但因敵眾我寡和孤立無援，港英政府最終於當年聖誕日投降，而香港亦走進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不少親歷侵略的港人，都視淪陷為香港歷史上最黑暗的階段。雖然日本最終戰敗，英國海軍亦於 1945 年成功進駐香港，但重光後港府的管治威信受到削弱，因為淪陷證明了英國在東亞敵人的壓力下保不住香港，而香港的歸屬問題亦因中國崛起和世界的反殖民浪潮而出現了變數。

* 通訊作者：譚家齊（kctam@hkbu.edu.hk）

前輩學者對港英時代香港的歷史教育有以下分析：相對於威權政府全權控制的「專政訓育型」（The State-Didactic Type），和民主政體教師與社會自主的「自由型」（The Liberal Type），港英治下的歷史教育政策主要是介乎兩者之間的「多元型」（The Pluralist Type），即教育工作者在政府劃定的粗略界限內，可自行編選歷史教育的課題，容許在大同下有小異存在（龐朗華，1987）。由於戰時的經歷是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同時英軍投降確是英國不光彩的一頁，戰後政府應怎樣處理這段淪陷的歷史，尤其在九七回歸前五十多年間的中學課程中，如何向未歷戰火的新生代，解說這個對香港民生和人口都大有影響的歷史片段，便成為一個探索殖民政府與華人精英在歷史文化場域互動的可能方向。因為這既是香港人在主場中親身參與的歷史事件，又有深重的現實政治含義。

香港中學的歷史教育問題，一直是香港教育史的重要範疇。其中代表性著作為簡麗芳的 *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Kan, 2007），當中強調香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作者，多以保存與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為念，以及港府因地緣政治的因素，對他們予以容忍乃至鼓勵。然而，此書對中國歷史課程中有關香港本地的史事有何論述，卻未有深入討論。龐朗華（1987）的〈四十年來香港中學的中國歷史科課程〉則交代了有關二戰以後，直到 1987 年香港中學的中國歷史課程發展細節，只是有關香港的史事如何在課程中展現，仍不在關注之列。此外，李玉梅（2005）的《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初中中國歷史教育——孫國棟編《中國歷史》教科書為研究個案》，以孫國棟所編人人出版社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對中國歷史在初中與高中獨立成科的過程、教科書審查的問題，以及擁抱中華中心思想的學者在香港中國歷史教育上的影響等議題多有發揮，提供了本文分析的不少重要資訊。另一方面，朱維理（2017）的〈1960 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本與二戰歷史記憶〉一文，不只討論了二戰後香港初中中國歷史科與（世界）歷史科這「兩史」的分合和發展概況，亦深入分析了香港初中課本對二戰的論述。但限制是只以孫國棟編的《中國歷史》課本，以及現代教育研究社編（黃福鑾校訂）的《中學外國史》（現代教育研究社，1966）為討論中心，並無對其他課本作系統的比較，而且關注重點在港英及香港右派對戰爭結束後的「重光紀念日」論述，如何與中國內地和香港左派的「抗戰勝利紀念日」論述抗衡，以見「復興中國文化／本土主義」與「中國天朝主義」的矛盾，卻未以專題討論有關課本如何論述二戰期間香港的情況，而以上的研究空白仍有待填充。

面對這段似乎難以啟齒的歷史，究竟戰後的港府是否對香港淪陷及日治時期這些有損英國威信的污點有意隱諱呢？為解答上述問題，本文搜尋二戰結束後港英時代見存的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教科書，以及藏於香港政府檔案處的政府教育部門課程文件和檔案史料，以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顯示自上世紀 50 至 90 年代香港的

歷史教學，是如何由完全視而不見，逐步到忠實呈現香港淪陷及日治歷史的進程。此外，我們亦輔以訪談方式，以了解教科書作者和相關教育官員在香港淪陷史教學問題上的見解，以說明殖民政府是否因為要將這些史事劃為禁區而加以隱諱。

詳遠略近：戰後中國歷史科對淪陷史的漠視

香港的中學教育主要分為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二途，至今未變。從 1945 年起直到上世紀 50 年代初期，香港的中文教學採用中國內地或台灣的教科書，而英文教科書則直接從英國進口，本地鮮有教科書出版（李玉梅，2005，頁 88）。重光初期港英政府曾考慮由官方為本地中小學直接提供課本，可是在殖民政府人力物力有限，兼且不少私立學校沒有受政府資助的情況下，此方案遠非可行之計。當局於是決定讓商務印書館等私人出版社提供課本，不過課程綱要則由官方提供。香港政府先在 1948 年復辦戰前的教科書常務委員會，為加強對教科書內容的審查，1952 年成立審核課程及課本委員會（textbook committee）（鍾燕齊，2021，頁 42–43）。自此以後，香港中小學的課程、時間表、教科書及一切教材，都得經由香港政府的教育司署批准後才可使用（Ng, 2022, pp. 67–70）。

原來戰後香港英文中學的中國歷史教育是依附在中國文學科之內，至 1953 年教育司署檢討了該科內有關中國歷史的內容，釐定了以下的教學目標：「中史教育要消除中國人的自卑，肯定中國文化的成就，從而重建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但卻不能藉此鼓吹民族自負和宣揚仇外的情緒」（龐朗華，1987，頁 73）。上述原則，大抵支配了九七回歸前香港的中國歷史教育。其實該次檢討的重點，在於中國歷史應否從中國文學課程中獨立出來，不過當年的決定是維持原狀。同一時間，香港的中文中學課程，則將中國歷史教育置於歷史科之中。此後經過數年爭議，教育司署終於同意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應分開為在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課程中皆有的兩個獨立科目（龐朗華，1987，頁 73）。自上世紀 60 年代起，香港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初中、會考及高考等不同級別的中國歷史教學，逐步獨立成科（李玉梅，2005，頁 1）。1965 年高中學制改革時，中國歷史便首度獨立成科，而中國歷史和歷史兩個歷史科的課本，便由政府以外的本地獨立作者分開來編寫（朱維理，2017）。

港英時代香港的中學課程頗為複雜，略可分為三年初中、兩年會考（為應付公開試「香港中學會考」而設），以及預科（高考）課程三大部分。作為大學入學應考訓練的預科，又分為以香港中文大學（1963 年成立，當時行四年制本科課程，1979 年至 1992 年間入學公開試稱「高等程度會考」）為目標的一年制，和以香港大學（1912 年成立，當時行三年制本科課程，1980 年至 2013 年間入學公開試稱「高級程度

會考」) 為目標的二年制兩種。上述不同課程各有發展脈絡，一個香港學生有機會在初中、會考和預科經歷三個或以上的中國歷史課程。

有關戰後香港中國歷史科發展的討論，例如對課程中有關中國朝代的內容變遷、旅港新儒家學者對史事評論的權威性，以及討論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事的選擇等，已有中英文著作深入分析 (Kan, 2007)。不過，論者亦難免隨他們批評的中原中心思想 (Sino-centrism, 又稱「天朝主義」) 起舞，鮮有探討該科如何處理跟香港有關的議題，彷彿中國歷史只是深圳河以北發生的故事；對二戰論述中有關香港淪陷的處理，自然較少關注。話說回來，史學討論應先集中對「既存」內容的探索，故此冷待了那些課程中「未存」的部分，實在亦無可厚非。

除了難以向課程和課本中未存的內容提問外，教科書史料的匱乏亦是研究者的難題。教科書實為針對當下教學需要而撰寫，涉及的是有關基礎教育或公開考試的知識，其中內容罕有存之久遠的學術價值，故在教育研究之外，不太受藏書機構青睞。香港公私機構對教科書系統性的收藏起步較晚，40 與 50 年代的中小學課本更多已散佚，偶見 60 年代的出版卻非整齊一套。例如香港的圖書館收藏最早的本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錢清廉 (1957, 1962) 編撰的《中國歷史》。這套現已殘缺的教科書原有十冊，1956 年的初版已完全散佚。其後再版個別冊數藏於不同的政府和大學圖書館，惟對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現代史的討論，卻在各大圖書館未藏的第九和第十冊內 (姚繼斌, 2012)。因為資料殘缺，要論斷當年課本有否涉及日治的內容，難免瞎子摸象 (李玉梅, 2005, 頁 14)。以下討論只能以香港的大學和公共圖書館所藏香港課本為主，將尚存的課本面貌盡量呈現出來。

因為中國歷史獨立成科，便能在中、英文中學的課程中全面而系統地講述由上古至民國建立的中國史事。民初至抗日的歷史，由於年代較近且爭議不少，港府初時順水推舟地要求教科書要「以沒有政治偏見的本地角度編寫」(朱維理, 2017, 頁 135)，故在知見的 50 與 60 年代課本中仍未將之收納其中，然而「本地角度」只是史觀，卻非指本地歷史的內容。

不過，1962 年教育司署頒布的《五年制中文中學歷史課程綱要建議》，卻容許初中 (中一至中三) 的中國歷史課程有很大自由度，這應是初中不用考慮太多公開考試的因素，教師更能以學生情況因材施教。當年由錢穆 (1895–1990) 校定、孫國棟 (1922–2013) 撰寫、供中三課程使用的《中國歷史》(孫國棟, 1962) 課本，其中第 33 章第 2 節，便是「『七七』事變與我國抗戰勝利」，將八年抗戰分三階段討論，而第三階段是以日本偷襲珍珠港談起，這裏首度將香港納入歷史的論述之中：「在太平洋戰爭初期，英、美失利，日本席捲馬來亞、香港、菲律賓及南洋各地，更進兵緬甸」(冊 6, 頁 90–95)。

對教科書作者較大的挑戰，是要在對應中學會考的高中課程上有所更動。在出版了初中課本後，孫國棟於翌年再出版了供應考會考之用的高中課冊（孫國棟，1963，冊9，頁81），其中更如初中的處理一樣，加入了日軍南進的論述，然內容則與初中部分並無二致。這裏的「席捲」香港說法，成為一種安全的用辭，為日後不少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課本所襲用。此外，同一時期其他出版社的高中中國歷史課本，有時索性只論述到民國成立為止，以避免捲入任何政治爭議。例如黃國梁（1964）於此時期編著的《中英文中學中國歷史》，便完全沒有涉及中華民國成立後的史事。

踏入70年代，教育司署因為歷史教育範圍太廣，必須因應課時就課程內容有所篩選，主動提出改革香港的中學中國歷史課程計劃，不過並沒觸及任何有關香港的課題（中學歷史科科目委員會，1980，第8-2份）。為搜集前線教師對新課程的意見，署方在1972年7月假金文泰中學舉辦「歷史研討會」（The History Seminar），廣邀官立及津貼學校的歷史科老師討論中國歷史課程應有的內容，尤其關注初中歷史教育的發展。與會者普遍認同教育司署提議的內容，亦討論了如何令學生不用死記硬背，從而提高學習歷史的興趣。至於會中最重要的討論，是有教師提出初中中國歷史教育應「詳近略遠」並包括「本地歷史和東南亞史的內容」（中學歷史科科目委員會，1980，第16和17a份）。因為當時仍沒有中三的公開考試因素，教師對初中教學內容便有較大自由度。

與此同時，港府在1972年成立由教育司署官員、前線老師和大學學者組成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為中、小學編訂教學課程綱要，當時的課程發展委員會是一個兩層的架構，第一層是主要委員會，而另一層則是負責各科課程的科目委員會和課本委員會，以取代過去由官方課本委員會直接審查教科書的方法。

中國歷史的課程發展委員會聆聽了前述歷史研討會的意見，在1973年的會議中考慮打破中國歷史的朝代框架，改以宏觀時段分期，並只略述上古歷史，然而未考慮加入本地和東南亞的內容（中學歷史科科目委員會，1980，第17份）。

教育司署於1974年卻統一了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的中國歷史課程，並將以朝代順序論述的框架更改為分為甲部「朝代史」和乙部「社會文化史」的模式。經緯圖書社（1973）修訂、專供1974年課程所用的中三級《中國歷史》課本，即開始系統介紹民初軍閥政治以及抗戰的情況，更有一節專講「中國八年抗戰之最後勝利」。在講到「珍珠港事變觸發世界大戰」的子題下，將香港亦納入其中：

〔日本於〕民國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美海軍基地珍珠港，香港、菲列濱亦於同日被襲擊，未幾，太平洋之英、美、荷屬地，次第為日本佔領，遂觸發世界大戰（冊6，頁180）。

上述敘事中只提到香港受襲，亦講到英國有屬地被日本佔領，完全避開了香港淪陷。

此後，1979年起實施的《中國歷史科會考課程綱要》，讓預備公開試、內容規管較多的高中中國歷史課程，在討論民國史時亦可以專節詳細討論「中日戰爭」。不過，由於專講中國與日本的戰鬥，當時為英國治下的香港雖然淪陷了，似乎卻不應放在中日瓜葛的框架之中，於是在課文的正文中便無任何篇幅。例如四海教育社編輯委員會（1981）的《中學會考課程中國歷史》第6冊中，以洋洋14頁的篇幅講抗戰的細節，甚至交代個別重大戰役裏中日兩軍的傷亡人數，而香港淪日的事實卻只於注釋中以「日本在1941年佔了香港和越南」一句帶過（冊6，頁159）。

1980年港府改組教育部門，將原來教育司署設計政策的部分改劃為布政司署的「教育科」，而負責落實政策的行政部門則改為「教育署」。因為香港整體高中學額不足，港府在1981年開始為中三學生舉辦「初中成績評核試」（俗稱中三淘汰試），以作學生升讀高中的門檻，兩史等初中課程便部分地成為應試教育，而此時的初中課程被批評為「採取相同的教學課程綱要」，失卻了原來因材施教的高度靈活性（教育統籌委員會，1984，段2.10）。1982年課程發展委員會頒布了更新的《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對中一至中三的初中中國歷史科有更多的指引。雖然因應當時日本竄改教科書侵華內容，不少中國歷史教科書加入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事，但此課程綱要的原則是減少對戰爭細節的描述（朱維理，2017，頁152）。綱要中有關民國和二戰部分指引，內容如下：

民初史實至為繁複，教師講授時宜加以濃縮。帝制運動與軍閥混戰，宜利用圖表作簡略介紹，毋庸詳述。北伐以後，干戈未息，國共又兵戎相見，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抗日，經八年苦戰，取得最後勝利。戰後，國共內戰復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介紹此段史實時，宜多利用地圖及圖片輔助教學。二次大戰期間，列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先後廢除，戰後，中國之國際地位大為提高（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1991a，頁61）。

初中新課程綱要正式改變了前此「詳近略遠」的安排，而在新的「詳遠略近」指引下，民國歷史便只作較簡單的處理。抗日戰爭的歷史，即置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分合的議題中討論，香港戰事情況備受冷落亦在預料之中。在新課程綱要頒布後，長河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在中三課本中將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後事蹟，歸納為「抗戰後期的形勢（1941.12-1945.8）」一節，雖有提到日本出兵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又談到國民黨軍隊協助英國在印緬戰線抗日，但在正文和注釋中，均無隻字提及日軍攻擊香港和英國在東南亞的敗績（長河出版社，1983，頁93-95）。

漸見光明：八九十年代中國歷史科對香港淪陷的論述

英國在 1984 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香港的前途問題逐漸明確，有關中國歷史及香港淪陷史的討論，亦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1987 年，「初中成績評核試」因為政府委任的外國顧問團強烈批評而正式結束，初中課程再非應試教育。同年，昭明教育研究中心出版了由呂思齊、梁政、胡志洪編寫的《中國歷史課本》，是書〈編纂說明〉中強調「關於史實敘述方面，力求簡明扼要，凡與主體無關的枝節，或瑣細的資料，都盡量省略」。或因如此，在中三課本中論述抗日戰爭的一節，只有 12 頁篇幅，仍如以往其他應試課本般，未在內文和注釋中述及作為「枝節」的香港淪陷。不過，書中以特選的插圖及解說，側面交代了香港在二戰中的角色，可說對本地學子認識香港歷史用心良苦：頁 102 上半版中，加入兩幅關於香港淪陷的插圖，該版左圖圖解為「1941 年 12 月 26 日，日軍舉行侵佔香港的入城式」；右圖圖解則為「日軍佔領香港時的總督部。圖中的人是總督日本陸軍中將磯谷廉介」。此外，有關戰後香港的歸屬問題，該書更於頁 119 的注釋中，明言中國在兩次大戰後成功爭取廢除了絕大多數不平等條約：「至此，除英國繼續佔住香港和保留九龍半島的租借權外，中外不平等條約都已廢棄」（呂思齊等，1987，冊 3，頁 119）。雖然此處論述淡化了主權爭議，因為被租借的應是新界和界限街以北的新九龍，而非整個九龍半島。不過無論如何，呂思齊等因應回歸在即的事實，將香港問題與中國抗日戰爭連結起來，對日後中小學教育中，能逐漸回顧香港在這段歷史中主體的角色，實在是初中中國歷史課本擺脫公開試陰影後重要的突破。

70 年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長足發展，加上港英管治有九七回歸這時限，香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編者為增強學生對本地的認識，對香港淪陷的論述亦愈見積極。這趨勢最明確見於周佳榮編著、教育圖書公司出版的《中國歷史》課本的不同版本之中。這套廣受市場歡迎的課本，其〈編輯說明〉強調以圖取勝：「本書內容力求簡明扼要，並盡量採用最新發表之研究成果及文物資料。每章均附注釋，供進一步之參考；並有彩色與黑白圖片多幀，及地圖、表解、歷代帝王世系表等，以增加學生的興趣」。在 1988 年初版的中三課本中，只以 8 頁交代國共合作和抗日的歷史，而且其中多是圖片和地圖，確是言簡意賅。談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仍只云：

由於日軍偷襲美國在檀香山附近的基地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引致美國向日本宣戰，中國戰場的形勢也開始有了變化。（周佳榮，1988，冊 3，頁 88）

課本文字的論述就此終止了。而對香港的處理則留在教師用書中，有關「太平洋戰爭」的詞彙詳解：

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後，美英結成同盟向日本宣戰。日本以為已擊潰美國太平洋地區的主力，便派兵席捲東南亞地區和太平洋的一些島嶼，包括菲律賓、馬來亞、香港、寮國、柬埔寨、新畿內亞西部等。（周佳榮等，1988，冊3，頁86）

這裏的「席捲」說法跟隨孫國棟的語調。可是將偷襲珍珠港與進攻香港，說成是有一個前後的時序，乃是有問題的，因為當年日軍兩線的攻擊乃同時展開，在紀錄中見到日期的差距，其實只是兩地時差的問題。

可堪玩味的是，本書在1997年「訂正重印」時，中三課本正文內的論述就按教師用書已有的內容作出修正補充：將「引致美國向日本宣戰」一句，改為「引致美、英向日本宣戰」，即將英國在太平洋戰爭重要的角色補回；更在句末加入一新注釋，正式交代了香港淪陷，同時訂正珍珠港事件與進攻香港沒有時差，以及談論英國戰時的不濟表現：

日本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南方軍隊分兵幾路進攻香港、馬來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緬甸，很少遇到頑強的抵抗，只用三個月時間，就摧毀並佔領了盟軍在上述地區（除緬甸外）的所有重要據點。（周佳榮，1997，冊3，頁1、88-89）。

此處論述香港淪日過程中未見頑強抵抗，似乎有異於近年研究展現的戰事實況：大英帝國軍（包括印度及加拿大等地部隊）在絕對劣勢下防衛香港時寸土必爭（鄭智文、蔡耀倫，2013）。無論如何，這些改動足見在回歸前初中中國歷史科的課程限制下，教科書作者盡量加入二戰香港「枝節」角色的趨勢，只是在課本的正文中仍欠缺正式論述。

在70年代以來由黃福鑾、譚松壽編寫、現代教育研究社出版的《中國歷史》，是另一套市場佔有率頗高的教科書。是書於1979年初版、「初中成績評核試」停辦的1987年出修訂版，以及在1991年出另一修訂版。在各版的中三課本中，對香港淪陷的處理與上述周佳榮的課本頗為相似。在講中華民國史的一章，第四節「日本侵華和八年抗戰」，有「東西戰爭聯成一線」段落，內容如下：

1941年，美國見日人野心日熾，禁止石油輸日，英美又發表《大西洋憲章》，反對擴張領土和武力侵略，隨即派遣軍事代表團來華。就在這一年的12月8日，日本突襲美國的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並向英、美宣戰，中國也同時向「軸心國」宣戰，於是亞洲的中日戰爭和歐洲的大戰聯成一氣。（黃福鑾、譚松壽，1979，冊6，頁115）

在多次改版中課本正文仍是不變，並沒有講述日本攻擊英美軍事行動的細節，幸而作者加入了一條亦是始終不變的注釋，對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作較詳細的論述：

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美國暫採守勢，日軍在遠東地區曾奪取廣大地域：1941年佔香港、陷越南；次年復進據菲律賓、馬來亞、印度尼西亞，並侵入緬甸（黃福鑾、譚松壽，1979，冊6，頁115、119；1987，頁89、93；1991，頁89、93）。

就此將香港淪陷輕輕帶過，亦將失陷原因跟英國的責任完全割離，解釋此乃美國戰略守勢的結果，彷彿是誘敵深入的圈套一樣。現代教育研究社中國歷史課本的教師用書，採設問對答的方式編寫，在問到「『珍珠港事變』發生後，對中日戰爭產生怎樣的影響？」，作者自己的回答是：

〔日本於1941年12月〕八日晨一時，開始對珍珠港發動偷襲，美國因疏於戒備，損失慘重。同日日機猛炸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等地，其陸軍則分別南進，在泰國、馬來亞、菲律賓、新加坡、香港、關島、威克島各處發動攻勢。（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1991b，頁89）

此處將香港戰事納入論述之中，卻無述及香港淪陷（黃福鑾、譚松壽，1979，頁170）。

在回歸前多套初中中國歷史課本中，對香港淪陷作最全面處理的，應是由梁一鳴、余炎光、陳偉明編著，文達出版社於1993年初版、再於1997年修訂改版的《香港中學適用中國歷史》。該書供中三用的第3冊，當中第17章「中華民國時期」以第5節專講「抗日戰爭」，其中一段講論抗戰「後期」的課文正文，直接提到日軍攻取香港：

太平洋戰事初期，日本大舉佔領華中和華南，並席捲馬來西亞、香港及菲律賓等地區（梁一鳴等，1997a，冊3，頁102）。

這裏亦是沿用「席捲」一詞，卻沒有如其他出版社一樣暗示英軍迅速戰敗。但這段論述可說是跳出了注釋和教師用書的框框，首次在初中中國歷史課本的正文中，直接說明香港淪陷於日本手中。這套課本最精彩之處，是在教師用書中對上述情況再加發揮，以「香港淪陷」為題，詳述此香港殖民史上幾乎最慘痛的一頁：

香港淪陷（102頁） 1941年12月，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進攻香港。日本海陸空軍同時出動，香港守軍經過十八天的防衛戰，傷亡四千多人。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香港共淪陷三年零八個月。（梁一鳴等，1997b，冊3，頁102）

此處述及英軍抵抗長達十八天，而且傷亡頗重，沒有再對香港「輕易」失守落井下石，接着更細道出三年零八個月香港的慘況：

香港淪陷後，英國官員和大商人被關進集中營，過着非人生活。一般市民則被勒令回鄉，規定香港只能保留五十萬人（當時人口約一百六十萬）。遣送市民回鄉的場面更是慘不忍睹。由於車船多被日軍徵用，碼頭又被封閉，日軍用帆船運送市民到華南海岸後，便讓他們自由登陸逃生。許多船中途被搶劫，或被日軍拖到公海後擊沉、焚燒。留下來的人更是苦不堪言。日軍把銀行存款凍結，以軍用票代港幣。百業停頓，糧食配給，柴荒嚴重，連家具也燒光。後來有限度地恢復商業，但店舖都成了日本商店，嫖賭盛行，治安極壞。（梁一鳴等，1997b，冊3，頁104）

在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回歸中國的一年，終於有中國歷史課本，願意全面論述香港淪陷及日治的歷史了。雖然只是教師的參考資料，但當中對英人保衛香港的貢獻和犧牲能正面表揚，未有因為去殖民化而歪曲史實，可說是客觀評鑑香港殖民歷史的優良示範。

為了將香港史的內容更系統地引入回歸後的初中中國歷史教育之中，課程發展議會（1997）便編訂了《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除了強調一改以往愈古愈詳的傾向，轉而強調「詳近略遠」的原則外，新課程的修訂重點是加入「香港史教育」，因為「認識本土歷史有助提高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以及建立鄉土情感和民族認同感」（頁4-5、34）。至此，有關香港淪陷的史事，終於在殖民統治結束後，正式經官方認可進入初中的中國歷史課程。當時對於在中國歷史科中加入香港史元素仍是非常謹慎的，強調不可因教授本土歷史而影響既有課程的進度（中學中國歷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1997，第110份）。在具體實施上，這個迎接回歸的中國歷史課程對「課題七：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戰爭」的處理，是加入了「圖片蒐集」活動，要求「學生蒐集有關八年抗戰及香港淪陷歲月的圖片，製成圖片集」（中學歷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1999，頁34），更加入了「八、附錄：香港史年表」，其中中三級甲部「國共第二次合作與抗日戰爭」部分，即有如下描述香港淪陷的內容：

1941年12月8日，日本越過羅湖邊界進攻香港，至12月25日進駐市區，港督楊慕琦爵士宣布投降，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代。期間香港市民曾被迫以港元兌換日本軍票；日軍擴建啟德機場作軍事用途；九龍城寨被拆毀，宋王台石塊被炸。（頁70）

不過，有關英軍抵抗的成敗事跡仍是略而不談，強調的卻是日本統治的陰暗面貌。隨後即交代了抗戰勝利及香港的命運：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香港恢復受英國管治。（頁70）

這裏沒再提香港易手的具體情況，只以「恢復」戰前狀態輕輕帶過。

1997 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改組教育政策部門為「教育統籌局」，2003 年又將該局與教育署合併為新的教育統籌局，此後在 2007 年再將教育統籌局改稱為「教育局」。2013 年，教育局的課程發展議會頒布《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推出新修訂的初中中國歷史課程，其中中三級的課題三「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更正式列明「香港的淪陷及抗日活動」是「預期學習內容」（課程發展議會，2013，頁 18）。綜合而言，中國歷史課程的香港淪陷元素基本上集中於初中課程處理，而應試為本的高中部分則「置身道外」。

本地元素：歷史科中的香港抗日論述

因為中國歷史獨立成科，有關中華文明的發展和中國的國族精神論述，既已集中在中國歷史科內，戰後香港中學的（世界）歷史科便有意略過相關內容，而討論中國以外世界歷史的進程。這個科目的官方名稱是「歷史科」，但坊間乃至教科書出版社多稱之為「世界歷史科」，以便跟「中國歷史科」對應。戰後香港中、英文中學的世界歷史課程發展，大概有一個偏重政治史、去歐洲中心化，以及教學本地化的趨勢（張行健，1987）。在 1962 年的《五年制中文中學歷史課程綱要建議》中，規定世界歷史分「遠東」、「不列顛帝國與聯邦及美利堅合眾國」和「歐洲」三部分，特別是延續中國歷史科的清朝部分，概論中外關係（朱維理，2017，頁 135）。課程因應本地情況，多談日本與東亞各國的「遠東」歷史，但本地的歷史多限在開埠時期，重視列強對中國的開發，以及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至於 20 世紀的香港，竟在本地的初中和高中歷史課程未獲詳細講論。

對有關香港淪陷及日治時期的處置方式，歷史科與中國歷史科手法大抵雷同。黃國梁（1964）在出版了前文談及的《中英文中學中國歷史》課本後，即於翌年推出了《中文中學世界歷史》。在「遠東部分」有「中日戰爭」一章，並無任何篇幅提到太平洋戰爭與香港有關。在講解日本的「民族主義及一九三零年以後好戰軍人的興起」一章中，亦無片言交代中日戰爭中涉及香港淪陷的史事（黃國梁，1965，頁 180-181、230-231）。此後，在 1966 年由黃福鑾校訂的《中學外國史》，終於在講述二戰有關「日本南進」的一節中，略為提到了香港：

太平洋新戰爭爆發，日本藉地理上的優勢，即閃電南進，佔領關島、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緬甸、荷蘭東屬印度等地，幾個月內，日本控制了整個太平洋（現代教育研究社，1966，頁 124-125）。

在 20 世紀 60、70 年代的初高中學歷史科課本中，未如中國歷史科用上「席捲」一類含蓄的字眼，然而亦是同樣輕輕帶過了香港淪陷的史事（朱維理，2017，頁 167）。

70年代初教育司署改革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同時，亦提出《中學歷史科課程建議初稿》。雖然在這個建議於1972年課程的「目的與方法」中，提到「如能以最務實的方法學習本地歷史，將對提升學生的好奇心、邏輯推理以及搜集資料能力有甚高的價值」，可是在初中三年級的內容中只有「中國與現代世界」和「兩次大戰與戰後的國際合作」題目，而課程中無論初中或高中的其他地方，並無任何部分觸及本地的內容（中學歷史科科目委員會，1980，第21份）。1974年針對這建議初稿的教師回饋中，便有針對此一落差提出的批評，建議在中一級的古代史教育中，加入以參觀李鄭屋古墓來介紹香港的考古發現，彌補本地歷史空白的缺口（中學歷史科科目委員會，1980，第26份）。此外，政府的其他部門和本地的考古學者，亦對本土史事失落於中學歷史課程有所反應。1976年3月，香港考古學會的代表秦維廉（William Meacham）便因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合作組成（考古）教育委員會，邀請教育司署派官員加入，共同編寫介紹香港考古發現的小冊子，並考慮將有關資料加進歷史科課程之中（中學歷史科科目委員會，1980，第46份）。不過，史學界對包括淪陷在內的本土歷史課題，還沒有必須加入歷史科內的共識。

1983年正式頒布的《歷史科課程綱要》，在二戰論述中只包括太平洋戰爭的珍珠港及中途島戰役，而完全忽略中國戰場和香港情況（中學歷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1989，第27份）。鄔健冰據此綱要於1986年編著了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香港高中歷史科課本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1760–1970*。此後，1988年中學會考歷史科建議的課程，在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課題中，仍只是列出「珍珠港戰役」，未有任何觸及香港的部分，因為課程的目的是「以全球視野來看歷史」，本土關注便顯得次要了（中學歷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1989，第43份）。1989年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了鄔健冰課本的中譯本《世界歷史》（譯者為曾越麟、周治淮），1992年又出版了訂正本。據中文版「編輯說明」，「部分內容因應中文版的需要而略作刪訂」。在該書供中五會考課程使用的第5冊中，論述二戰「太平洋戰事」爆發的章節，有一題為「1941年12月世界大戰全面展開」段落，卻能如中國歷史課本作者黃福鑾般，簡單交代日軍佔領香港的情況：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隨即佔領菲律賓、香港、馬來亞、印尼和太平洋島嶼。（鄔健冰，1992，冊5，頁i、552）

不過，其後二戰後期軸心國節節敗退的細節，再無談及香港。要注意的是，當時高中的課程綱要原來就沒有提及香港戰役，但鄔健冰等作者仍在可能情況下，加入了少量本土的元素。在90年代初以前，高中歷史科課本對20世紀中有關香港的論述，大概都是依循這個範式。

相對於高中課程較保守的處理，香港政府和歷史教育者對香港回歸中國的另一反應，是在初中歷史課程中，加入更多香港史的本地元素，以推動公民教育並加強歷史知識與當代中國情況的關連。事實上，有關變革最先出現在最高等級的預科課程之中：1991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實施改革，考生可應考歷史等科目其中約一半的內容，此即「高級補充程度」。是年，課程發展議會（1991）編訂《歷史科課程綱要（高級補充程度）》，其中「亞洲史」部分以「香港」為獨立一組，以「日治時期的香港（1941至1945年）」成一專題，討論此時期香港社會內部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變化，包括日治時期的生活、工作狀況、教育及社會政策」（頁13）。翌年，課程發展議會（1992）更推出了代表預科歷史完整全科的《歷史科課程綱要（高級程度）》，其中「日治時期的香港（1941至1945年）」專題，除了照搬高級補充程度的內容外，亦加入了日治時期「香港與世界」互動的內容：「重要的本地事件／發展、其與中國國內情況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大勢的相互關係及影響」（頁14）。只是由於預科歷史科的選修人數甚少，一直罕有專門的教科書。

在加入香港史元素的趨勢下，終於在1996年課程發展議會（1996）編訂了針對初中的《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適用）》，課程改革重點在「強調研習本地史的好處」，而教學宗旨之一是「加強學生對社區及本土文化，以及對世界其他主要文化之認識」。在中三級的課題二「二十世紀香港的成長和發展」中，加入了「日治時期」此一教學重點，包含了「香港淪陷」及「日本統治下的生活」兩方面的內容，相關說明為：「學生應認識香港在二十世紀的成長和發展。教學重點應為日治時期的生活、由轉口港到國際金融中心的轉變以及與中國的關係」（中學歷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1999，頁3、13）。由是觀之，香港淪陷史在港英統治末期，在歷史教育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不過課程新內容在初中歷史教科書的具體落實，已是九七回歸以後的事了。

淪陷論述闕如的初步分析

如果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解讀香港政府在香港推行的中學歷史教育課程，認定英國統治者對香港淪陷的歷史是有意隱諱的，便會推論他們擔心對日戰敗及喪失香港會損害殖民政府的統治威信；而且身為殖民者的英國，在二戰後處理香港的教育問題，是以盡量避免觸及現實政治或引發政治事件為原則（李玉梅，2005，頁9-10），若要他們去批評本質跟自己類似的日本殖民者，似乎亦是一大難題，因此沉默似乎是他們最佳的選擇。這些都可說是非常合理的推論。然而，由於英方未有公開明言此一政策，現仍未見官方檔案中有相關的說法，因此未可視作的論。

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歷史科評核經理、前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中國歷史科高級課程主任梁操雅，在接受本研究訪談時指出，他在 90 年代初期進入中國歷史科課程及考評系統以來，未見教育當局有明文指引關於日治時期的處理方式，不過課程把關在於教科書的審查，而審查原則並不完全公開，通常是各科的管理人員對政治及教育形勢的理解，自行指引相關作者。他指出香港的中國歷史科是特別歷史背景下出現的特殊科目，是港英政府表現對中國傳統尊重的手段。而原來香港史相關的議題，亦不太受史學界與教育界重視，因為關懷的重點在傳統中國史。及至 90 年代初因眾多難以綜合的社會政治因素，社會突然湧現要於歷史教育中加入本地內容的強烈意見，此或促成回歸前將香港淪陷史加進中國歷史和歷史兩科的原因（梁操雅，私人通訊，2023 年 7 月 7 日）。

另一位前中國歷史科高級課程發展主任黃浩潮，在前後兩次訪談中，同樣指出自 1996 年進入教育署工作以來，政府並無就如何處理日治的歷史作過任何明文的指引。他認為中國歷史課程不談香港淪陷的原因，是因 70 年代以來課程的歷史論述，乃是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羅香林的《中國民族史》，以及新亞書院歷史系錢穆的《國史大綱》兩者互為補足地形成的，因為兩者皆是教師和教科書作者的主要學術背景。而在這種以中原漢民族為中心的史觀下，便難以包含任何香港本地的元素。在技術上因為課程下限長期只到 1911 年，亦沒有空間提及香港淪陷；而且課程多數時間是分為以時段劃分的甲、乙、丙三組，在只需選教甲、乙或乙、丙兩組的要求下，多數學校皆選前者，以鴉片戰爭或辛亥革命開始的丙組便乏人問津，亦令教科書作者對此時段內的香港元素缺乏興趣。當課程後來開始觸及抗日戰爭時，因為羅香林和錢穆親國民黨的傾向，戰事的論述便站在國民黨對日作戰的立場，故此亦不處理英日之間的和戰。他又指出，在九七回歸前歷史科本有意先引入了香港本地史的內容，背後原因應為政府、學界乃至市民皆認同必須增加學生對香港的歸屬感；有關安排即引起了中國歷史科前線老師的反響，認為本土歷史的教育應歸入中國歷史科的範疇，故此有關香港淪陷等香港史教學的內容，便在 90 年代後期逐漸加入中國歷史科之中（黃浩潮，私人通訊，2022 年 1 月 24 日，2023 年 5 月 21 日）。

此外，自 2006 年 9 月起接任的另一位前中國歷史科高級課程發展主任雷武鐸，在接受訪談時亦確認在他的教學生涯及官方身分的知見之下，政府在該科中並無處理日治的任何指引。他指出淪陷與日治不見於中國歷史教學，應該是殖民政府在教育中「不談政治」這政治手腕的其中一個面相（雷武鐸，私人通訊，2023 年 5 月 14 日）。黃浩潮亦指出在彭定康（Chris Patten）擔任香港總督（1992–1997）以前，港英教育強調的是「不談政治」，前此任何可能引起本地政治討論的歷史元素便少有觸及（黃浩潮，私人通訊，2023 年 5 月 21 日）。

如前所述，因為香港政府不能為中小學直接提供教科書，而要依賴私人出版社提供相關課本，為了審查這些教材的內容，香港的教科書自 50 年代起便有出版前送教育當局審批的制度。教科書作者在用詞、詮釋和取態上有一定的自主性，不過作者和出版社有時會揣度政府心意，而出現了過分憂慮的自我審查，但仍不算是直接反映了官方的立場（李玉梅，2005，頁 13、67、79）。李玉梅（2005）的《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初中中國歷史教育——孫國棟編《中國歷史》教科書為研究個案》第 8 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教科書控制機制、政府政策與作者取態」（頁 87–107），便專論有關審查制度。她指出港英的審查機關會以「不合意」的政治原因，阻止學校使用有問題的教科書，但卻不會向作者或出版社明言相關的政治問題為何，使政治及意識形態禁區成為潛藏的規則，以維護殖民統治。

但從教科書作者的經驗看來，香港官方罕有直接干預教科書的編撰，審查主要針對有關教學的技術性問題（周佳榮，私人通訊，2021 年 12 月 8 日）。李玉梅（2005）指出香港政府一直公開對教科書的要求，是「本地觀點、立場不偏不倚」。

不過，雖然港英當局未有隱諱香港淪陷歷史的教育政策，但因香港歷史教科書隱沒淪陷史事的主因未明，便有空間讓我們推敲此等隱諱的其他可能成因，從此分析更多英人治下香港歷史教育的考慮與問題。

其實，相較於二戰英軍在東南亞其他戰場強差人意的表現，駐港軍隊在海陸空的絕對劣勢下，仍能在孤立無援中負隅頑抗，不惜沉重傷亡的代價，給予侵略日軍頗大的打擊，可說是英國在太平洋戰區中罕有的亮點。香港淪陷亦公認是非戰之罪，若妥為宣傳包裝，更可突顯英國對香港的珍視，沒有隱諱的必要。事實上，香港政府自 1946 年起便將重奪香港的 8 月 30 日訂為「重光紀念日」，每年悼念保衛香港犧牲的各國將士，市民大眾亦一直知悉日治的史實。此後，在 1965 年更在香港電台推出官方立場的《香港史話》節目及廣播文稿專冊（司徒胡君麗，1965），即毫不諱言英國戰敗的細節。

因此，我們認為香港淪陷問題所以罕見於中學中國歷史科和歷史科課本，應該不是政府有意隱惡揚善的結果，而更可能是基於戰後亞太地區的國際情況：冷戰的新形勢，以及東亞地緣政治的變化，可能令英方對在學校中講述淪陷有所顧忌。首先，二戰後中國即爆發內戰，無論國民黨抑或共產黨，都對香港歸屬英國有所挑戰，而英人讓香港新生代淡化對香港淪喪的仇恨與記憶，應有助減少市民對英國重掌香港的質疑。在 50 至 70 年代香港左右兩派往往發動反英示威，因應 1956 年香港的右派暴動，香港政府在 1958 年的英文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便規定「不提日本侵華」（張行健，1987，頁 80）。內地又有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香港更在 1967 年的暴動中風雨飄搖，甚至可能隨時被中國強行收回（李玉梅，2005，頁 109–110）。香港政府為此甚至在 70 年代以前，基本上抽起了高中中國歷史課程的現代史部分，

有意令香港學生對中國產生疏離感（龐朗華，1987，頁 73-74）。既然整個近現代中國都不談了，他們自然亦不想重提那段英國人曾經失去過香港的歷史，以免挑動香港人敏感的神經。

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即於 1950 年參與韓戰，而日本隨即在冷戰中加入英美的反共陣營。英國且跟隨美國於 1951 年 9 月與日本簽訂《對日和平條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通稱《舊金山和約》），在法理上與日本結束任何敵對的關係。既是盟友，香港政府為求減少港人對日本的敵意，便盡力淡化日本對香港的殘暴統治。60 年代以後日本經濟起飛，雖然香港企業面臨日本的競爭，港人難免憶起日本的侵略，但有關輿論只在報章出現，未及教科書層面。香港政府甚至有意令新生代親近日本，以吸引日本的投資和旅客。踏入 70 年代，香港雖有保衛釣魚台運動，但參加者多為有識之士和大學精英，普羅市民少有響應。在此形勢下，為免火上加油，日本侵略香港的往事，香港政府自然沉默是金。

無論如何，現見資料無法反映香港政府在中學的歷史教育中，有隱諱香港淪陷及日治時期的政策。故此，因應回歸前夕中國內地複雜的政治形勢、去殖民化過程中香港人主體意識的興起，以及末代的殖民政府容許港人更多了解並討論政治的氛圍，教育界以致整體社會便有將本地歷史內容納入歷史教育的強烈要求，而香港淪陷的史事便能在港英當局毫無阻撓下，逐步進入初中中國歷史和初中歷史等人文學科課程之中。

結 論

雖然日治時期不算是香港教育中難以啟齒的歷史禁區，但在殖民統治中被視為一個可能涉及「政治」的議題，故此在「不談政治」的教育原則下便長期被有意無意忽略。當然，除了殖民政府因地緣政治外加的因素外，有關戰後香港人口組成的內在因素亦不能忽視：戰後抵港數以百萬計的華人，多視香港為暫寄之地，他們對這個外國殖民政權的過去，未必感到興趣。即使香港政府放任中國歷史教育由南來學者主導，但無論是教科書作者抑或教育部門官員，卻多持中原中心論或「天朝主義」，視香港為中國的「邊陲化外」。香港政府原來亦沒有設計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教育，因此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太平洋戰爭的情況，香港淪陷對於中國抗戰成敗乃至二次大戰的結果可說是無足輕重；若是置於中國史或世界史的論述框架中，略而不談亦屬無可厚非，最多便是當成「枝節」而草草帶過。此等忽視本地歷史角色的態度，只能待香港土生土長的學者和新生代學生，都開始視香港為自己的家園，加上香港從殖民統治回歸祖國的「港人治港」新階段，香港淪陷的本地記憶才會跟他們的生活有確切的關聯，才最終能成為香港本地歷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註釋

1. 本文初稿題為〈難以啟齒：港英時代中小學教科書對香港淪陷的論述〉，發表於香港三聯書店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合辦的「香港淪陷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2021年12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

參考文獻

- 中學中國歷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1997）。〈政府檔案處檔案（11.11.1983-25.7.1997）〉（檔案編號 HKRS1225-5-53）。
- 中學歷史科目委員會（1980）。〈政府檔案處檔案〉（檔案編號 HKRS1225-1-86）。
- 中學歷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1989）。〈政府檔案處檔案（14.8.1980-10.7.1989）〉（檔案編號 HKRS1225-1-87）。
- 中學歷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1999）。〈政府檔案處檔案〉（檔案編號 HKRS1225-15-29）。
- 司徒胡君麗（著），許性初（譯）（1965）。《香港史話》。香港廣播電台。
- 四海教育社編輯委員會（1981）。《中學會考課程中國歷史》。四海教育社。
- 朱維理（2017）。〈1960年代以來香港初中中國歷史及歷史課本與二戰歷史記憶〉。《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55卷第2期，頁123-185。
- 呂思齊、梁政、胡志洪（編）（1987）。《中國歷史課本》。昭明教育研究中心。
- 李玉梅（2005）。《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初中中國歷史教育——孫國棟編《中國歷史》教科書為研究個案》（未出版碩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 周佳榮（編）（1988）。《中國歷史》。教育圖書公司。
- 周佳榮（編著）（1997）。《中國歷史（訂正第二版）》。教育圖書公司。
- 周佳榮、屈啟秋、劉福注（1988）。《中國歷史教師手冊》。教育圖書公司。
- 長河出版社（編）（1983）。《中國歷史（中學三年級適用）》。長河出版社。
- 姚繼斌（2012）。〈半世紀前香港中史教科書中的廣州十三行：以錢清廉史書為例〉。載趙春晨、冷東（主編），《廣州十三行與清代中外關係》（頁548-564）。世界圖書。
- 孫國棟（編）（1962）。《中國歷史》（初中）。人人出版社。
- 孫國棟（編）（1963）。《中國歷史》（高中）。人人出版社。
- 張行健（1987）。〈戰後四十年來香港中學歷史科課程〉。《教育學報》，第15卷第2期，頁76-82。
- 教育統籌委員會（1984）。《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教育統籌委員會。
- 梁一鳴、余炎光、陳偉明（編著）（1997a）。《香港中學適用中國歷史（第二版）》。文達。
- 梁一鳴、余炎光、陳偉明（編著）（1997b）。《香港中學適用中國歷史（第二版）教師手冊》。文達。
-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黃福鑾（校訂）（1966）。《中學外國史》。現代教育研究社。
-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1991a）。《中國歷史教師手冊（中學三年級）》。現代教育研究社。

-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1991b）。《中國歷史教師用書（中學三年級適用）》。現代教育研究社。
- 黃國梁（1964）。《中英文中學中國歷史（全九冊）》。香港宏豐圖書。
- 黃國梁（1965）。《中文中學世界歷史（全九冊）》。香港宏豐圖書。
- 黃福鑾、譚松壽（編）（1979）。《中國歷史——第六冊》。現代教育研究社。
- 黃福鑾、譚松壽（編）（1987）。《中國歷史（中學三年級適用）》。現代教育研究社。
- 黃福鑾、譚松壽（編）（1991）。《中國歷史（中學三年級適用）修訂版》。現代教育研究社。
- 經緯圖書社（編）（1973）。《中國歷史》。香港文化服務社。
- 鄔健冰（著），曾越麟、周治淮（譯）（1992）。《世界歷史》（訂正重印版）。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1）。《歷史科課程綱要（高級補充程度）》。教育署。
-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2）。《歷史科課程綱要（高級程度）》。教育署。
-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6）。《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適用）》。教育署。
-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1997）。《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教育署。
-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13）。《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課程發展議會。
- 錢清廉（編）（1957）。《中國歷史》。友聯出版社。
- 錢清廉（編）（1962）。《中國歷史（全十冊）》（修訂版）。中英出版社。
- 鍾燕齊（2021）。《課本物語：穿梭百年時空的課堂》。中華書局。
- 鄭智文、蔡耀倫（2013）。《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天地圖書。
- 龐朗華（1987）。〈四十年來香港中學的中國歷史科課程〉。《教育學報》，第15卷第2期，頁68-75。
- Kan, F. L. F. (2007). *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Ng, M. (2022). *Political censorship in British Hong Ko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law (1842-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Critical Inquiry on the Scarcity of the Narrative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1941–1945) Found in the Textbooks of the
Subject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y from Colonial Hong Kong**

Ka-Chai TAM

Abstract

This article enquired how the textbooks of the subject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y for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had presented the Fall of Hong Kong (1941–1945) during the Post-World War II British Colonial Rule (1945–1997). After collecting all available textbooks found in the libraries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archival materials of the Hong Kong colonial governmen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roblem of absorbing the Fall of Hong Kong or not happened mainly in the lower form secondary textbooks of the two history subjects.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the inclusion of the topic could be described as from completely ignoring, to discussing in the footnotes, photos, and the teacher's manuals, and to eventually putting these issues into the text in the few years before the Handover. Buttressed by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stakeholders, the key observation to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ilence of the history textbooks on those main local historical events during World War II is that there was no official policies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o hide the embarrassing defea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newer generations of Hong Kong; rather, it was more possible the result of Sino-centrism and self-censorship of the textbook authors. Thanks to the strong demand of inclusion of local topics to the secondary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1990s, which is arguably the result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Hong Kong citizens to discover their ownership to the futur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Fall has fin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histor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Keywords: the Fall of Hong Kong; Japanese Occupation; local history; Chinese history; history textbooks

